

明史研究论丛

第二辑



明史研究论丛

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辑主编：王统铨
本辑编辑：王春瑜

明史研究论丛

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10,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 册

书号：11100·108 定价：1.65元

责任编辑 王士君

目 录

瓜蒂庵读明代史乘题识	谢国桢	(1)
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	伍丹戈	(9)
李定国简论	洪煥椿	(27)
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	张显清	(56)
洪武时期宦官考略	栾成显	(90)
试论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	商 传	(114)
明代江南市镇研究	樊树志	(133)
明代灶户的分化	周远廉 谢肇华	(161)
关于明代铺户的几个问题	许 敏	(178)
明初吴中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初探	林金树	(197)
明末三饷加派	郭松义	(220)
明代京畿地区白莲教初探	李济贤	(246)
嘉靖、隆庆年间农民起义初探	南炳文 李小林	(266)
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根源	左云鹏	(281)
《明史》的纂修及史学思想	汤 纲 王鸿江 傅贵九	(302)
王世贞的史学	顾 诚	(331)
明代东开原毛怜卫考	徐健竹	(347)

论蒙古三娘子的历史作用……………徐 凯 (363)

〔读史札记〕

“温、安”辨……………周绍泉 (376)
明永乐十七年税粮额校正……………习 之 (381)

〔国外明史研究动态〕

《中山八郎教授古稀纪念明清史论丛》简介
……………[日]中山美绪 (383)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明史研究近况…………… (389)

瓜蒂庵读明代史乘题识

谢国桢

《何氏语林》跋

忆余髫龄，侍先祖仲琴公于邺下，初入私塾，命余寄读于五叔祖季筠公之衡斋，与五先叔朝夕供读，早出晚归。趋庭之暇，先祖每授以《毛诗》及《说文》部首，略能上口。先祖恒以读书致用相勖，桢虽童稚无知，然窃以自喜，且以自励。时则槐荫满院，新月窥窗，室内灯火莹然，景致幽洁。又喜听祖母为余讲故事，瞪目静聆，每至更阑，催督者再而犹不肯入睡。回首童年，恍如昨日事。未几随先父锡成公游官砀山，及再返里门，不幸先祖业已见背，余之识先祖声容笑貌者约略如此。先祖素多藏书，余获有明刻白棉纸本《何氏语林》、晋藩本《唐文粹》等书，藏诸箧笥，期以永宝。于时风云变幻，家道中落，当夫入洛之年，由邺来京，肄业上岸，又櫻于家累，不得已斥售书物，以作负笈之资，因之先祖楹书多不能守。

比长游食四方，佣书之暇，泛览群籍，酷嗜乙部，尤喜研治明清稗乘；然稚鲁寡能，疏于考核之学，而粗通条贯之旨，逞于博涉，茫无归宿。久之乃知何元朗者为明嘉靖间松江名宿，侨居金陵，执东南坛坫者且二十年；而家松江，筑有清森阁，藏书四万卷，名画碑帖称是，尝曰：“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每叹其言之隽永而有深解者。元朗名良俊，著有《语林》及《四友斋丛说》等书，《语林》旨在述古，《丛说》意在知今。《丛说》流传较少，余既请于中华书局为活字版印行之。《语林》则以刊刻佳美，纸墨精良，而以

书中刊印牌记，品类多种，式样清新，与奇字斋本《王右丞集》、佳趣堂本《世说新语》同为明刻佳品，早已脍炙人口，余久心耳其名，且亦玩赏其书；然以其钞撮成书，等于杂纂之书，未能深喻其著书之旨趣也。^幸即读范蔚宗《后汉书》、严衍《资治通鉴补正》，见其所载前人佳言懿行，足资发人深省，或可喜可愕之事，每欲抄而存之，以当馈贫之粮。因思元朗之书，自《世说新语》以后，继之者虽不乏人，而《语林》一编，实为杰作。

盖《语林》之作，非仅撮辑丛残，省人涉猎，而清寂澄汰，时有创见，足以益人之智慧，于是知清乾嘉间学者，以其考订之长，而诋谟名理之短者，未为笃论也。恒欲董理往事，举出例证，以发明人之复；又欲籀读龚定庵、魏默深今文学家之言，以纠正考据家徒为书蠹无的放矢之失，心怀此志蓄之有年，惜玩时阅日，力有未逮。乃平时自思，虽嗜书成癖，依若性命；然不骛于藏家之喜好，奢谈板本，而驰骋于皮相之论，外观之美者，志趣颇与之不同，因之人舍我取，颇具别尚，此者虽一己之孤旨，偏嗜之所在，而与拾人牙慧者，盖有间已。乃以一介寒素，食贫自守，车涔马迹，奔走四方，或力之所不能致，或因饥而易米，如是书者，已屡得而屡失之，顷又见是书于某书友之书架上，求之而不能得。客岁腊尽，占毕余闲，驰车阅肆，陡见此书已归于中国书店，乃节衣缩食，以倍于原价，重金得之。是书确为原刊初印，棉纸洁白胜雪，黑浓如漆，较原藏之书为善，使余青毡归守，得以合浦珠还，借以不忘先祖期待之殷，俾余得以献身社会，敦余劬学知非之志，而与奇字斋本《王右丞集》同在椟中，可不谓幸事欤！

吾所以书此者，以志余得书之难而知书尤不易也。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写成，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日晚即壬子中秋前二日重改定，谢国桢记。

《留青日札》跋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明钱塘田艺蘅撰。艺蘅字子艺，承其家学，博闻多能，所著之书，摭拾丛残，记述芜杂，为例不纯；然高瞻远瞩，不为俗囿，颇具别裁，时有创见，世多称之。书经问世，已屡为传刻，在万历时即有万历元年癸酉自刻题香宇外集本，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其婿徐懋升刻本及四十二年乔时敏删节刻本，题曰《留青》，凡六卷。其书虽删繁过多，有失本义，然间有补充，如谈陶磁等条为原本所无。其他明代丛刻若《纪录汇编》、《百陵学山》均载其书，亦间有异同，是盛传于一时可知。惜至清乾隆以后，其书反晦，亦无人为之翻刻者，因之公私藏家多无其书。

余嗜读明代乙丙两部之书恒欲纂辑丛残，揭其精华，蔚为一编，以飨读者。以是书为有明一代杂家之冠，求之多年，虽见有此书，乃以阮囊奇涩，寒士青毡，纵见之而不能有，遂为有力者所得，然未尝不企予望之。年来占毕辟雍，握丹怀铅，恣我探讨，颇有暇日，益深自幸，庶足以医我时过之愆，凡有我需用之书，未尝不心向往之。闻有某君藏书，虔有是编为四库底本，钤有翰林院印，并有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进呈书签，惜缺卷三十四至三十九六卷一册，承书友作缘，为我求之有年。今春多雨，灯前点滴，细听檐花，辄无足迹。一日傍晚，新雨初霁，斜阳在树，落英缤纷，坐窥窗外见书友骑自行车，持蓝布书袱，挟是书至矣。乃摒挡故物，竭其所有而易得之。并请萧十一丈用工楷书是书缺卷，补其不足，复借各本，略校正之，其为是书所无者，附录于后，庶足成为完书。所谓：“礼乐攻吾短，诗书引兴长”，晴窗展玩，偶一读之，足以使吾老眼犹明也。一九六四年五一节，国桢记。

《尧山堂外纪》跋

《尧山堂外纪》一百卷、《尧山堂八朝偶隽》八卷，明蒋一葵编，明万历间刻本。一葵字仲舒，别号石原，武进人，万历甲午举于乡，再上春官不第，除广西灵川令，后迁任京师指挥使。一葵长于文学，喜著述，其所摭拾，取舍所向，颇有明初瞿宗吉之风，平生撰述甚富，为当时市井人所喜，而流传于后世者不广。其所著《长安客话》为朱彝尊编《日下旧闻》时采取其说颇繁，然仅存钞本，解放后始有铅印本流行于世。

仲舒著述，余所得者为《唐诗选》残存四卷，及是书，一得于沪渎，一获于燕市，皆余书囊中铭心之物也。是书与田艺蘅《留青日札》一记明代朝野掌故，一记历代诗文逸事，同为明代稗乘中之上选，然子艺之书，名满当时，见重士林，而尧山之作则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且未列其名字，则不以其瑚琏小品有市井之风，未可以喻大道而少之欤？据其自序云：“尝谓前代骚人墨士负有当时重名，其所著撰琳琅琅，脍炙人口，顾稍涉俳谐，见谓无关世教，辄为高头巾先生唾弃湮灭不传，尚论者无从窥豹一斑，深可惋惜。夫虫吟鸟鸣总属天籁，矧出自锦肠绣腹者乎？爰命童子以奚囊随，会解颐处则以片楮录之，载有正集不录，录散见于稗官野史不经人见也者。岁久汇次成帙，命曰《尧山堂外纪》；尧山堂者余读书堂名，曰尧山志先君之恩也。”又云：“溺于宋景文之好，因循以有今日致身不蚤，风木徒悲，何嗟及矣。于是取前所录悉付之祖龙，勿以贼夫人之子盖甲午九月也。戊戌南还过白下，见市中有鬻是书者，惊汗浃背，亟追其故，则书贾从奚童购得副墨，以援削劂，犹是甲午前事云。业既流布，不能禁其不行，徒伤雅道，且悖孝思，因摭其颠末，以暴余过，用谂夫罪我者。”余粗流览是书，见其所记历代文人遗事，摭拾古人诗词佳句，极为赅博，以其多为流俗传闻之事，故不理于明

清士大夫之口，实则自明以至清季，尚无统记历代文学源流掌故之书，有之亦一鳞半爪之作，惟此书杂记历代文学源流，可作中国文学史读也，研究文学史者亦应取材于斯。

惟作者宗瞿宗吉之遗风，故于世俗流传，如苏轼、秦观、陆游、关汉卿、马致远、瞿佑、解缙等人遗事，摭辑颇备，至其记元代词山曲海之作，尤曲尽其详，元代文学，赖之以传；使其所纂《金元曲谱集》若流传于世，必有可观。故其撰述，既涉及葑菲细小弗捐，便后之读者引流寻源，亦可知故事俗说之来源。惟作者之旨，专在搜揽市井通俗文学，然不采民歌民谣，劳人思妇之辞，则囿于缙绅士夫之传统，犹存文士之积习，其卓视远见尚在冯梦龙之下。且其书真伪杂陈，不加鉴别，如苏东坡、解学士等人之遗闻风说，以讹传讹之事所在皆是。其他各家传说亦难以缕举，然世风相习，市井传闻之辞亦因之以传，所惜者不注出处，使读者不能知其来源，惟有待于后人辨别而已。

至其书所记颇为通说，为稍识文字，酷爱文学，商人市民喜见乐闻之事，故极乐道于人口，驰声于阑阙，且流传于海外，即余所得之本，外加皮纸硬面，为朝鲜装订之本，重返故国者，是知此书已见重于鸡林矣。余既得《留青日札》，欲觅此书，久求之而不获，今乃于无意中得之，是则铭心之物，蓄于所好，久之乃能得之，可遇而不可求也。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休沐之晨写此。

《梅花草堂笔谈》跋

余藏明张大复著述，题《梅花草堂集》者，凡有二种：一为武进董氏旧藏《昆山人物传》十卷，明崇祯间写刻本；一为鄞县马氏旧藏《笔谈》十四卷，明季刻清修补本，钞配后二卷。大复尚著有《闻雁斋笔谈》（北京图书馆藏有明刻本）。大复字元长，昆山人，以所著《梅花草堂笔谈》闻名于时，而《昆山人物传》较为难得，记有明一代昆

山显晦人物颇备，传中列有冯梦龙，窥其行事，实非作曲家墨憨斋之冯梦龙也。陈继儒序《笔谈》云：“宋之士大夫家居退闲，往往能称说朝家故实，及交游名贤之言行，而籍记之，有国史漏而野史独详者。王荆公云‘不读小说不知天下之体’，非虚语也。”又云：“元长贫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买书而好读异书，老不能徇世而好经世，盖古者狷侠之流，读其书可以知其人矣。”今读其书，盖不脱明末公安竟陵之习，谈茶说酒，吟风弄月之流，故尔为世俗所推重，然间亦记经世之作，钱谷、屯田、漕河、海运之事，亦足备考史之资。家有容安堂，息庵之胜，田园悠游之乐，名为贫而实不贫，盖明季山人盗名者流。但所交颇广，所记由万历以迄明末江南之骚人词客，琐事遗闻如所记魏良辅、梁伯龙之遗事，徐宏祖之性喜远游，为母作《秋圃晨机图》，亦艺林之掌故也。元长为人旷达，宗李卓吾之遗风，颇有遗世而独立之趣，然喜谈禅而又耽女乐，何以自相背谬如此，此则明季地主绅衿之奢侈生活与夫无聊文人之积习，于元长一人之身见之矣。

《西山日记》跋

余恒谓收藏书籍，征集资料，性所夙耽，且多于无意中得之，然不可无识。如心中无数，茫然无知，则虽遇奇珍美箭，犹如废材也，而易于交臂失之。余之得《西山日记》初不知其书之可重，亦茫然置之，及读《涵芬楼秘笈》所收是书之旧钞本，与刻本篇目颇有不同，内容亦互有出入，且云：“蓼庵刊本，已不可得”，则是书之罕见可知矣。是书凡二卷，题苕西丁元荐长孺甫著，清康熙戊辰先醒斋刻本。元荐长兴人，万历廿四年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旋削籍归，《明史》有传。

是书篇目卷上为英断、相业、延揽、才略、深心、名将、循良、法吏、节烈、忠义、清修、直节、德量、器识、神识、正学；卷下为古道、友

谊、义侠、格言、正论、清议、文学、师模、庭训、母范、孝友、笃行、方术、高隐、恬退、持正、贤媛、耆寿、家训、日课、五箴等篇，与影旧钞本相较，日课钞本列入上卷。钞本嵌家训一篇，多清赏、镇压、诙谐、因果、天数五篇。是书仿《世说》及《何氏语林》之体，记有明一代缙绅士夫遗闻琐事，有评有骘，然间述及明正德以后刘六、刘七等农民之起义，地主豪绅盘剥寒素，投靠纳献，致激民变之事。如云：“官令到任，不问百姓疾苦，先问钱粮多寡”，足以见明代末叶官吏之贪污。并记明万历时丈量田亩，及明代设立里长、粮长之利弊，与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有关，余已采入拙辑《明代稗乘笔记资料汇编》中。书中称其为人“赋性急而不能忍气”，颇称唐子畏之放及杨循吉之廉，盖其为人，尚不失为耿介之士也。

余与是书先后收得者，尚有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周应宾《识小编》、叶权《贤博编》等书，合而观之，均可为谈明代掌故之资者。今日为星期日，早游玉渊潭归来，披览丛残书此。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五日黄昏，国桢记。

《南吴旧话录》跋

一九五八年二月余将由津门返京，偶游天祥市场书肆，见有旧钞本《南湖旧话录》及明刻都穆《使西日记》，有黄丕烈印，以索价过高，乃购得是书。是书为毛装未剪裁本，为海丰吴式芬据商邱宋氏旧藏钞本移录分为上下卷而增补前后共四十四则，后有铅印本，即据此本以付印者也。原书题曰《南湖旧话录》。嘉兴之鸳湖一名南湖，而此则专记松江上海乡贤遗事，故应名为南吴也。题赵郡西园老人口授，孙尚䌹补撰，七世孙汉徵引释。西园老人为李延昱，据《松江府志》云：“延昱字辰山，上海人，初名彦贞，字我生。师事同郡举人徐孚远，为其高第弟子，尝从孚远入浙闽，后隐于医，居平湖佑圣院中为道士。其卒也，以书籍二千五百卷，赠秀水朱彝尊，彝尊为

志其墓，叙次详尽，著有《放鹇亭集》、《南吴旧话录》。”余昔年游平湖，观书于葛氏传朴堂，见有《放鹇亭集》旧钞本，自日寇南侵，平湖被兵，其书不知流传何所矣。

是书仿《世说新语》体，杂记有明一代淞南名人，遗闻逸事。当夫明季野史稗说仿《世说》体者，若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王暉《今世说》，率多摭拾陈言韵语，近于标榜之风，此书杂记琐闻遗事，犹可见明季淞南社会风俗，而于明末抗节之士，尤为致意，可以见其坚贞之风。其七世孙汉徵，引证群书作为注释，极为详核。刻本分别孝友、俭素、恬退等类，此则不分类别，随手札记，读之可以引人入胜，较局于一隅分类者为善，如记松江之产布，上缴政府，统治者勒索无厌，致引起地方布解之苦。同此以产布之故，松江富室张秉素以漂染起家者，即当时之染坊也。江南大族，依托豪门，造作家谱，以势凌人，霸占民产，欺诈小民，当时无耻文人若袁铉辈专以造赝谱为业，此可见明清时代江南之陋习，经久而不能改者。

至记李待问之抗守松江，壮烈牺牲，余曾藏有待问手写《湖上送春》七律一首，诗字俱佳。范濂著《云间据目抄》记松江社会风俗、丑诋豪门缙绅，为当时权贵厌憎之。是书记濂字叔子，愤嫉薄俗，弃博士弟子籍，服山人服入余山，隐居以终，均可作淞南之掌故。是书读之，亦可见著者纂述之旨矣。

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

伍 丹 戈

明代的身份地主是由皇室、藩王、贵戚、勋臣、宦官、官僚、举贡、生监、吏胥等各种社会集团组成的。其中由官僚、举贡、生监等人形成的“绅衿”集团，是主要的组成部分。绅衿所享受的赋役上的特权和豁免权对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怎样成为身份地主？明代的绅衿地主是在什么条件下造成的？这些我已经在“明代绅衿地主的形成”一篇文字中试作了一些分析。但是明代的绅衿地主是在什么时候兴盛的？又在什么时候衰落？这个身份地主阶层的兴盛和衰落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对于这些问题，虽然提到一点，却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本文就试图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绅衿地主个体的倏兴倏衰

明代绅衿地主的兴起很迅速，一个人一旦中了进士，做了官，那么，不要多久，就可以从贫无立锥的书生变成一个田连阡陌的身份地主，可是他的衰落也很迅速，往往在他身死或失势以后不久就门庭冷落，家产荡然。万历时人何良俊叙述松江的情形说：

“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舆为翰林编修，北野官至郎中，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犹如寒士。曾定庵（时中），其兄九峰（时和）举进士，有文章，定庵官至宪副，弟时信，亦京朝官，与李文正结社赋诗，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他如蒋给事性中，夏宪副寅，许金宪玲，致仕家居，犹不异秀才时。”

至正德间，诸公竟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以易主，子孙贫匱至不能自存。宋大参即余外甥家，得之目击者。此四十年间事耳。然此十万之业，子孙以善败，亦安能如此之速，盖若天怒而神夺之然。然一时有此数家，或者地方之气运耶？或诸公之遗谋未善耶？皆不可晓也！”^①

何良俊这段话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他讲得很具体，还列举了当时这些官户的名字，显然不是向壁虚构的。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家财巨万的官户为什么衰败得如此之快？虽然他说这些都“不可晓”，但他紧跟着也在下文中试作了一个答案：

“人见当时数家之事，有问于余者。余戏语曰：此病已在膏肓，非庸医所了。吾昔饮池上水，或庶几能知之。盖吾松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抑且恶闻其名。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而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皆此辈也。夫一齐人之傅，尚不能胜众楚人之咻，况又无一齐人之傅乎！吾恐子弟虽有颜闵之资，欲其从善，难矣。诸公皆读书晓事，此亦理之易见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谓‘利令智昏’，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②

正德以后的乡官孜孜为利，他们的子弟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照理说，这些子弟别的不行，对于“营产谋利”的勾当，应该是既熟悉，又精明，怎么在继承巨大的遗产之后不但不将它们加添得更多，增长得更大，反而将它们极其迅速地败落得干干净净，比平常人家还不如？何良俊在上面所作的解释在逻辑上是难讲通的。但是他所讲的情况却又是事实，只是原因还要进一步探索。我觉得，这些绅子弟既然孜孜为利，被隔绝在传统教育或

科举教育之外，他们所亲近的是钱财而不是书本，这样，他们不仅缺乏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文化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同时也丧失参加考试、猎取功名的本领。原先创业的缙绅的死亡，那么，挣取和保持这些家产所必须的特权也就随之丧失或消逝。缙绅的家产既不是来自财产本身的孳生，也不是凭藉商业经营的才能，而是起源于特权的行使。特权的消逝也就是它们藉以存在的根据的丧失。特权来自身份。身份一经丧失，那么其他一切也就随之而完全丧失，那怕“营产谋利”的本领再高明也无济于事。松江这些缙绅子弟的破产，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将他们保持家产的基本条件——缙绅身份保持下来。所以，明人王士性所说：“缙绅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③的话，倒是从实践中得到的很深刻的见解。

明代绅衿凭藉权势攫取财富固然极其容易和迅速，可是他们在丧失权势之后家产的败落也是同样容易和迅速。他们以平民为吞噬对象，当他们本身死亡使家属成为平民或者本身失去身份和权势成为平民的时候，这个家族和家产也就成为新兴的其他缙绅吞噬的对象。这种事例是常见的。有一个缙绅修坟，佣工取用旧坟材料的故事是流传得很广的。据衡郡文林《琅琊漫抄》记载：

“瑞安高世则墓有穹碑一通，吴中太湖石所著。碑阴锯纹朗朗而散。闻宣德间，永嘉黄少保淮葬父，锯其半为神道碑。锯且尽，高之裔孙某君曰：‘相公取之薄矣！’黄问故。高曰：‘恐后人复欲锯耳！’黄默然。”

“松江钱尚书治第时，多役乡人而砖甓亦取给于彼。一日，有老佣后至，钱责其慢。对曰：‘某担自黄瀚坟，坟远，故迟耳。’钱益怒。老佣徐曰：‘黄家坟故某所筑，其砖亦取自旧冢中，无足怪者。’此事与高绝相类，可以为戒也。”

上述故事中后面一个的发生时间较迟，却更加出名^④。这个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不仅缙绅们以强凌弱，当权的压迫失势的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新陈代谢，此起彼落，其兴衰也是极

其迅速的。上面担砖的老佣，在他的一生中已经替缙绅们将同一块砖从别人坟墓上盗用过两次。绅衿们随着他们身份的建立而掠夺别人，又随着他们身份的丧失而被人掠夺。绅衿自己就很有感慨地说：“明季缙绅，多收投靠而世隶之，邑无王民矣。然主势一衰，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产，坑主资财，转献新贵有司，因而投牒兴讼者。有司亦惟力量是视而已！”^⑤“力量”即权势，它是缙绅安身立命的基础。

最为显著的是明末清初名流钱谦益一家的历史。这部家史充分表明缙绅家族门庭的盛衰和经济地位的升降，完全以他们本身的身份和特权的存在与否为转移。钱谦益的为人，虽然并不完全象他的政敌指使的常熟人张汉儒所控告的那样卑鄙、贪婪和凶恶，但张所提出的秽行和罪状也不见得完全出于虚构和捏造，他的财富和地产显然总是有从“吸人膏血、啖国正供”之中造成^⑥的。在他当权和发迹的时候，所遇到的是人们的锦上添花的馈赠、投献和奉承；但到他失势下台的时候，所遇到的却是人们的讦告、陷害和弹劾；尤其是在他死去不久，尸骨未寒的时候，他的同族中一向依附于他的绅衿钱遵王、钱朝鼎、钱谦光、钱曾等人，就联合起来向他的亲属进行侮辱、敲诈和勒索，结果除了被这些凶恶族人攫取大量的财物、田产之外，连他的爱妾柳如是也被迫自尽^⑦。这里明白显示：身份和权势的消失也就是财富和家产丧失的前兆。

明代缙绅门庭长期保持富贵的事情是不多的。明末清初松江人曹家驹将明代松江的名门大族排列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当中没有一家能够保持富贵超过五代，只有嘉靖时候入阁后来当过首辅的徐阶是唯一的保持五代富贵的家族。“文贞（徐阶）生仰斋（…以荫官至太常卿），仰斋生寅阳（…万历甲戌进士，官太常卿），寅阳生蓝皋（…荫官至锦衣卫指挥佥事），蓝皋生澹宁（…官至太子太傅，左军都督），五世华抚。至澹宁之子而式微，甚有逋粮殒命者。然止就其冢子推算耳，其支子不得比隆焉。”^⑧这里很明显，徐阶一